

# 历史转折

张树军◎主编 唐筱菊 卜伟华 陈少铭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中国

# 1977—1978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因而遭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的反对。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成为了这一年党

二月，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指出「两个凡是」的提法是错误的，要求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从而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



# 历史转折

张树军◎主编 唐筱菊 卜伟华 陈少铭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中国

# 1977—1978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转折: 中国 1977—1978 / 张树军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5438 - 5536 - 6

I. 历… II. 张… III. 历史事件 - 中国 - 1977—1978

IV. K27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9158 号

## 历史转折 中国 1977—1978

主 编: 张树军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莫金莲 黎晓慧 洪江水

装 帧 设 计: 魏 剑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31

字 数: 561000

印 数: 1 - 1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5536 - 6

定 价: 48.00 元

---

营销电话: 0731 - 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历史在这里拐弯

1977年，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的第一年，也是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重要一年。当时全国正面临着一种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文化教育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

1978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转折之年。某种抉择——摆脱“左”的梦魇的纠缠，以经济发展为主轴，悄悄向发达国家靠拢的发展主导型战略——已经开始发端。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任何一种行为首先是在思想中酝酿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也不例外。本书通过收录于光远的《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沈宝祥的《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吴兴唐的《“三个世界”写作班子的回顾》、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经过》、孙长江的《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孟凡的《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雷声宏的《〈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等当事人的回忆，详细记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摆脱精神枷锁，以及由此带来经济、社会等一系列深刻变革，从而为中国历史发生伟大转折奠定思想基础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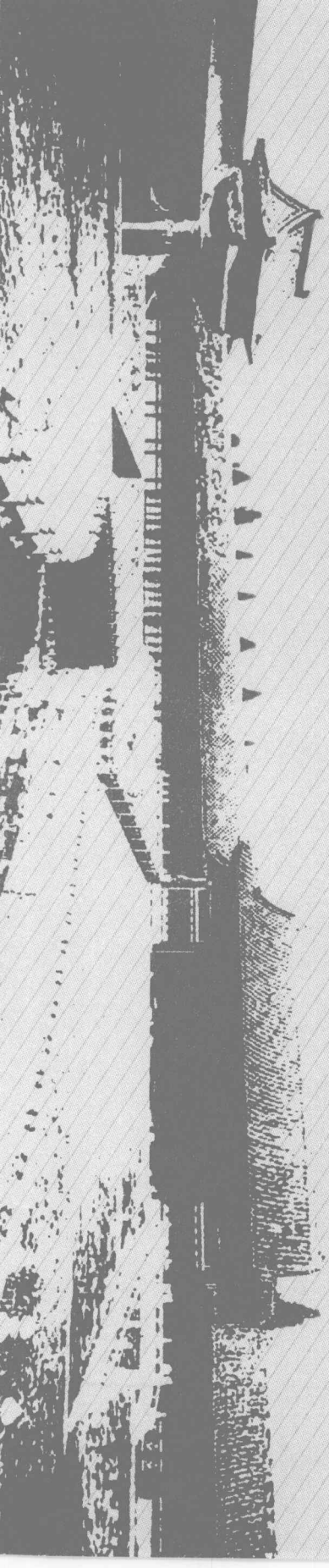
思想上的解放是最基础、最根本的促动因素，但作为一个国家，仅有思想变化还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把这种新的思想转化为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党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把思想上的解放转化为国家的方针政策。本书选编了陈大斌的《一次别开

生面的会议报道》、沈宝祥的《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傅颐的《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于光远的《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陈鹤桥的《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等，为读者深入了解和认识转折时期党的会议的基本情况、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性转折的伟大意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非凡勇气的党。“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两年，我们党进行了大规模、有秩序的拨乱反正。本书选辑了刘道玉的《拨乱反正当为先》、张瑞芳的《“而今迈步从头越”》、沈容的《钓鱼台杂忆》、武建华的《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于光远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汪东林的《政协委员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纪实》、陈丕显的《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温济泽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刘回年的《“西单墙”面面观》等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党拨乱反正的勇气和决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成堆，旧有的规章制度被打破了，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如何对待“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教育思想旗号推出的所谓教育改革措施？中国教育何去何从？本书选辑了吉伟青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李琦的《1977：570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沈宝祥的《中央党校的新生》等，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有人将中国的农村改革比喻为“蛹破茧化蝶”——蛹从里面将茧咬破（其所选择的突破口恰恰就是橄榄形茧的最薄弱部分）。1977—1978年，因为具备了社会和思想环境，中国农村的改革成为一种必然和有延续性的动力。本书选辑了陈大斌的《“穷过渡”的最后挣扎》、周日礼的《1977年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张冠生采写的《包产到户第一村——小岗村风云》、陈大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琐忆》、张广友



的《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等，展示了中国农村改革初掀波澜的景象。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改革也迈出了第一步，陈锦华的《新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上海宝钢的决策、建设历程》反映了我国在整顿被“文化大革命”破坏严重的工业领域所取得的光辉业绩。

统一思想是统一行动的前提，是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重要保证。为了贯彻落实党的拨乱反正方针，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为主的宣传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沈宝祥的《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李庄的《徘徊中前进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新生》等为我们展示了这一阶段宣传战线的波澜风云。

1977—1978年，中国的外交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缅关系获得了恢复和发展，中美开始建交谈判，邓小平访问日本，中国加强了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等等。本书主要辑录了陈瑞声的《礼遇与怀念—记邓大姐1977年出访缅甸及两次接待吴奈温》、王立的《美国驻华大使在1977》、叶飞的《揭开“阿波丸”之谜》、曾建徽的《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柴泽民的《中美建交亲历记》、江培柱的《记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周边邻国》等，展示了中国外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并不认为亲历者对某个重大事件的观点是某个事件的唯一解释，而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别的亲历者的证言、证词，最大限度把某个历史事件的全貌展示给读者。

## 思想解放

-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 于光远 ..... 002
- 耀邦指导我们办《理论动态》 沈宝祥 ..... 017
- “三个世界”写作班子的回顾 吴兴唐 ..... 031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产生  
经过 胡福明 ..... 038
- 我与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 孙长江 ..... 052
- 回顾胡耀邦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 孟凡 ..... 059
- 《红旗》发表谭震林文章的前前后后 雷声宏 ..... 069

## 转折会议

- 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议报道 陈大斌 ..... 078
- 1977年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始末 沈宝祥 ..... 086
- 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 傅颐 ..... 094
- 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 于光远 ..... 099
- 我所亲历的党的中央工作会议 陈鹤桥 ..... 104

## 拨乱反正

- 拨乱反正当为先 刘道玉 ..... 116

“而今迈步从头越” 张瑞芳 .....	139
钓鱼台杂忆 沈容 .....	146
将“四人帮”押解秦城实录 武健华 .....	155
“天安门事件”平反真相 于光远 .....	170
政协委员为 1976 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	
纪实 汪东林 .....	182
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陈丕显 .....	19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 温济泽 .....	207
“西单墙”面面观 刘回年 .....	223

## 教育改革

###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

前前后后 吉伟青 .....	242
1977：570 万青年是怎样走进考场的 李琦 .....	249
中央党校的新生 沈宝祥 .....	259

## 经济改革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 陈大斌 .....	266
1977 年安徽“省委六条”出台前后 周日礼 .....	276
包产到户第一村——小岗村风云 张冠生 .....	282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改革报道	
琐忆 陈大斌 .....	298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 张广友 .....	311
新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上海宝钢的	
决策、建设历程 陈锦华 .....	328

## 宣传动态

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 沈宝祥 .....	354
徘徊中前进的人民日报 李庄 .....	375
《光明日报》的新生 苏双碧 .....	385
我对《未定稿》创刊的一点回忆 李凌 .....	391





## 对外交流

礼遇与怀念——记邓大姐 1977 年出访缅甸及两次 接待吴奈温 程瑞声 .....	396
美国驻华大使在 1977 王立 .....	409
揭开“阿波丸”之谜 叶飞 .....	420
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 曾建徽 .....	432
中美建交亲历记 柴泽民 .....	451
记 1978 年邓小平副总理出访周边	
邻国 江培柱 .....	466
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 杨波 .....	471

# 思想解放

1977年是我国拨乱反正的重要一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被粉碎，一场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思想路线，实行拨乱反正，推动各项事业改革的新的任务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其时，尽管「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两个凡是」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及不能搞群众运动等框框，都成了一条条绊脚绳，阻碍着全国人民揭、批、查「四人帮」及其余孽。在思想上展开一场解放运动已势在必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一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出如此轰动的效应，其根本就在于是否定「两个凡是」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当真理标准的讨论被蒙上阴影时，邓小平发话了：「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与政研室的命运

作者于光远，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经济学大辞典》主编。1915年8月5日生于上海市。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64年担任了国家科委副主任。1975年恢复工作后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1977年他再次恢复工作后，负责筹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他担任副院长，1979年又兼任该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这一期间，他还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务。1982年，他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后，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

同政研室的建立一样，政研室的更名也同邓小平直接相关。如果说政研室的建立是他第一次复出的结果，那么，政研室的更名就是他第二次复出的结果。政研室的更名实际上远不止是一个机构名称的改变问题，而是一场关于这个机构的存废之争。“四人帮”被粉碎了，遭“四人帮”围攻的政研室本该从政治上翻身，怎么还会面临存废的问题呢？事情还得从粉碎“四人帮”讲起。

## ◎揭批“四人帮”

揭批“四人帮”，大家都是用全身心去投入。那些日子里，人们对粉碎“四人帮”的由衷欢愉和揭批“四人帮”的酣畅，真难以用文字来形容。

1976年10月6日晚，身居党和国家领导层高位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隔离审查。史称粉碎“四人帮”。隔离审查“四人帮”的行动两个小时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我是第二天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那天，司机借来一辆吉普车，我去了唐山。唐山大地震后，我一直很想去看看这座城市灾后的情况，这时正好没有人管我，找到了机会。从唐山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一到家，老伴就告诉我那四个



邓小平

人被抓起来了，真是天大的好事。隔离审查“四人帮”和华国锋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当时并没有马上公布，我得知的还属于非正式消息。不过，像粉碎“四人帮”这样的事情，是怎么也保不住密的，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不胫而走。

在内部，党中央从10月7日至14日连续召开打招呼会，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传达了有关“四人帮”的事情。国务院政研室听到正式传达是15日和16日，临时领导小组（这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政研室成立的运动领导机构，在运动中实际成为日常工作领导机构，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维持了一段时间）分三次逐级向全党党员传达了华国锋的打招呼讲话。实际上，听到正式传达之前，政研室已经开始揭批“四人帮”了。10月9日，政研室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职的决议，就在讨论中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了声讨。10月20日，我们收到中共中央16号文件，立即在全室进行了传达。听了正式传达之后，政研室更是大张旗鼓地展开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大概全国都统一在这一天传达文件，从第二天开始，首都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庆祝这一胜利。政研室也是在第二天开大会，会后全室人员走上街头游行庆祝，接着第三天、第四天又举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庆祝游行。记得三次游行我们几位负责人也都走上了街头。我曾说过，对于“批邓”，政研室绝大多数人都是敷衍应付；而揭批“四人帮”，大家都是用全身心去投入。那些日子里，人们对粉碎“四人帮”的由衷欢快和揭批“四人帮”的酣畅，真难以用文字来形容。

政研室的揭批运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宣扬的一套极“左”理论，写出一批批判文章，有些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发表，其中有几篇反响很大，如《一个大阴谋的真相》、《“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的口号》、《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刁小三的逻辑与资产阶级法权》、《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还有一个方面是清理室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开始后不久，室里许多同志要求停止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个别人参加临时领导小组，并且在临时领导小组下面设立运动办公室，负责领导运动的日常工作。临时领导小组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由于光远、邓力群和机关党支部书记及一名群众代表组成运动办公室。顺便交待一下，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党中央作出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第二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工作机构（简称“毛办”）。吴冷西、胡绳、熊复原来主要的工作

就是编《毛选》，所以去了“毛办”。至于李鑫，早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初，他就已经不怎么来政研室了，粉碎“四人帮”后，他很快当上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和“毛办”副主任。

## ◎撤销政研室的决定

政研室在“批邓”中就是被围攻的单位，在揭批“四人帮”时又被撤销，给人印象似乎政研室犯了多大错误。政研室始终背着“黑锅”，政治上无法翻身。

1977年春，当政研室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传来了政研室要撤销的信息。

3月4日，我和邓力群接到通知，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吴庆彤和国务院值班室负责人（兼国务院政工小组负责人）贾鲁峰找我们传达国务院撤销政研室的决定。吴庆彤告诉我们，政研室撤销的问题，中央政治局研究过了，但是他不清楚具体情况。吴庆彤说，政研室撤销的事情，已经让国务院值班室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批下来了。这个报告很简单，吴庆彤对我们口述了一遍。主要内容有四条：一是政研室撤销后人员去向问题，当时政研室人员共41人（不包括李鑫），机构撤销后，参加《毛选》五卷编辑的5人调归中央办公厅，邓力群调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其余35人一律回原单位工作；二是文书档案整理后，交国务院办公厅；三是图书馆交回红旗杂志社；四是做好思想工作和善后工作。

听了吴庆彤的传达，我感到突然，也觉得不平。事情的由来我们一无所知，而整个报告只讲了政研室人员的去向，对撤销政研室的原因一字未提，对政研室成立以来工作的评价一字未提，对“四人帮”强加给政研室的污蔑不实之词也未予澄清。是不好提，还是认为没有必要提，吴庆彤没有解释，可能他也解释不了，因为他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政研室在“批邓”中就是被围攻的单位，在揭批“四人帮”时又被撤销，给人印象似乎政研室犯了多大错误。政研室始终背着“黑锅”，政治上无法翻身。政研室的同志精神上势必感到压抑，难以抬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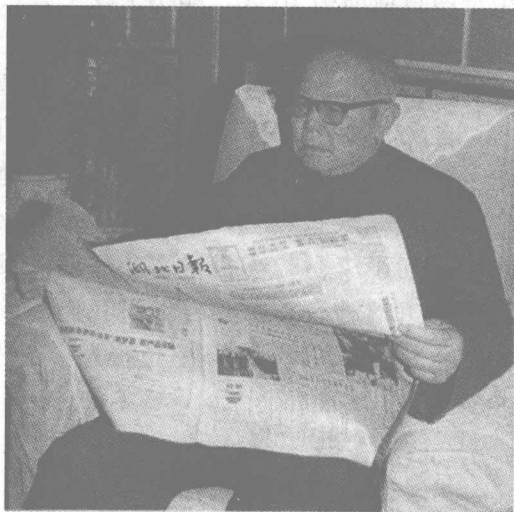
现在来看，政研室的撤销同那时的大背景不无关系。我一开始就说过，政研室的命运是同邓小平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邓小平受批判，政研室遭围攻；粉碎“四人帮”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停止，当时的说法是揭批“四人帮”，附带“批邓”。“四人帮”一粉碎，干部群众中就发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工作的呼吁。但

是，当时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态度是消极、拖延，甚至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使得包括这两件事在内的拨乱反正的工作遇到很大阻力。显然，邓小平的“案子”翻不过来，政研室也无法翻身。不过，依我观察，撤销政研室不仅仅同当时的大背景相关，还另有原由，只是直到现在我并不清楚这原由到底是什么。

当然，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的事情，即便有意见怕也难挽回。但我当时还是表示了这样一个意见：政研室的同志有些可以回到原单位，也有一些原所在单位已经撤销，如果政研室再撤销，就没有单位可回了，对这些同志一定要妥善安排。会上有人主张没有单位的人北京安排不了，可以安排到外地。我颇不以为然。

回到政研室，按照中央的要求，我找林润青起草有关政研室撤销工作安排的报告。报告要求对政研室的工作作出公正的评价，澄清“四人帮”对政研室所造的谣言，并且做好总结，完成一些尚待完成的工作，安排好人员去向。我还建议在政研室结束前集体参观大寨和大庆。

报告上交后，3月28日，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召见政研室负责人。李、纪、陈当时都是国务院负责日常工作的副总理。那天我因事没被找到，邓力群去了。大概是我们的报告起了作用，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在谈话中都肯定了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同“四人帮”所作的斗争。李先念说：1975年政研室同“四人帮”是作了斗争的，收集了文艺和报刊方面的材料，反映了他们在这些方面乱搞的一些情况。你们对“四人帮”的那一套作法，是看不惯的。对“四人帮”的宣传，你们是不满意的。对他们的“理论”，你们是有不同意见的。李先念还说：政研室一成立，就引起“四人帮”的注意。把这些老秀才搞到一块，他们是很讨厌的。“批邓”以来，“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一个重点，他们很想从政研室钓上大鱼。李、纪、陈还询问了政研室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个别人的情况，最后批准了政研室撤销工作安排的报告，也同意我们参观大寨和大庆的计划。李先念在报告上批示后说：就照他们的报告办吧！纪登奎最后还说了一句：让他



李先念

们作一个精彩的结束。基，真，对部最更态前人年婚委生央中景的出也，最  
政研室的工作虽然得到了肯定，但是它的撤销看来已成定局。这之后，政研室忙于做鉴定、做总结，参观大赛和大庆的事情一时也顾不上。

## ◎转机

我们要搞现代化，不搞科学技术、不要教育不行。我们要上去，空想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5月份的两件事，使得事情出现了转机。

5月3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的两封信。这两封信的转发，实际是向党内预告邓小平将重新出来工作。这是许多党内老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斗争的结果。尽管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消极、拖延，尽管有“两个凡是”的方针阻碍，但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就在我上面提到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人郑重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有这些，使得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把此事提上日程。这次工作会议，一方面仍然肯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另一方面也宣布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将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就是这次会议之后的一个步骤。这是一件事。

另一件事，5月中旬，我从冯兰瑞那里听说，5月12日，也就是中央转发邓小平两封信的第10天，邓小平找了方毅、李昌谈话，谈了有关科学、教育方面的问题，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这表明邓小平很快就会出来工作。冯兰瑞建议我们政研室也找邓小平。

自从“批邓”运动以后，我们政研室就失去了同邓小平的联系。现在得知了有关邓小平的消息，我们非常兴奋。大家都想等待邓小平正式复出，保住政研室。我请冯兰瑞打听怎么同邓小平联系，也想找他谈政研室的问题。冯兰瑞问了李昌。李昌说邓小平是在西山召见他们的，政研室可以同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联系，并告诉了我们王瑞林的电话。

经过联系，我们政研室负责人于5月24日拜会

### 红色链接

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

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

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又指出：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还要搞规划。《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讲得还不够，是根据当时大家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现在各部门掌握的资料都不交流，保什么密？自己封锁自己。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

了邓小平。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也在座。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邓小平谈了很多问题。他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说：“‘两个凡是’”是不对的。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还说：“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上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上，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上，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有些话主席自己承认讲错了。主席就讲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错误，



王震



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修改呢？修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这就证明以前犯过错误。主席讲自己也犯过错误，如果说每句话都对，没有这回事。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是个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主席这么说。马、恩没有说过‘凡是’，列宁也没有说过‘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我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我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当做体系来看待。”

邓小平谈了外界十分关心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事情。他说他出来工作的事已经定了，还幽默地说：“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还要继续管外事，但是除了参加重要的外事活动，不想把大部分时间卷进去。他说他现在考虑科学教育，接着说了很长一段关于科学教育的话。邓小平说：“我们要搞现代化，不搞科学技术、不要教育不行。我们要上去，空想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现在看来，我们整整落后了20年，科学技术、教育都落后了20年。科技人员美国120万，苏联90万，日本也花了很大的力量。我们科技人员只有15万。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注意搞科技搞教育的问题。我们现在就要有明治维新的精神、彼得大帝的神。在抓科技的同时，必须同时抓教育。”邓小平谈到要为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做研究工作时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对自己工作的分配，他有抓科技教育领域的愿望。后来在他正式恢复工作的几天里，他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们，他已经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得到中央同意。

谈话最后，邓小平讲到了政研室的问题。他说：“你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由此他还谈到了被诬为“三株大毒草”的三个文件：“三株大毒草”，“论总纲”确实在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十八条”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文章没有。

这次谈话的节录，后来分别以《“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邓小平的谈话，很快在政研室作了传达。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复职，虽然谈话没有明确说政研室还撤消不撤消，但是他说“以后再说”、“人总还是要用”，使我们感到保留政研室已经有了希望，大家备受鼓舞。为了拖延时间，等待邓小平出山，我建议政研室全体人员继续完成参观计划，不过不再去大寨，而